

打开 文学的视野

贺桂梅/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评论卷

所谓“走出去”，涉及文学研究者如何获得较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累积和一种“知识分子”的介入意识。所谓“返回来”，则意味着将文学问题重新理论化或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能力。这两个层面的结合，我称之为“人文学的想象力”。

打开 文学的视野

贺桂梅/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评论卷

学术策划与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开文学的视野 / 贺桂梅著 .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2017.4

(身份共同体 · 70 后作家大系 / 孟繁华 , 张清华主编)

ISBN 978-7-5329-5359-2

I . ① 打… II . ① 贺… III . ① 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 ① I206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6260 号

打开文学的视野

贺桂梅 作品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	---------------------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页 1/2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359-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尚待完成的批评变革

——关于“70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

孟繁华 张清华

“70后”这个命名，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个阶段，大约还是一个不明之物。因此，当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批评家提出之初，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对这个命名的质疑或不满，是晚近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当没有能力提出重大问题的时候，纠缠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实无必要。我们的意思是，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一代新人就这样矗立在我们面前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有依稀可见的共性。当要讨论这代人的文学批评的时候，使用一个有“通约”可能的概念也未尝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码三十多年来的文学概念，大多是临时性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实验小说”“小女子散文”“闲适文学”“文化散文”“女性文学”“海外文学”“离散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等，不一而足，哪个概念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作为切近的文学现象，谈到一个概念我们大抵知道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这便足矣。眼前的文学现象谁有能力一览无余一目了然呢？因此，与其纠缠于差强人意的概念问题，不如着力探讨一下其内部的问题。

这里要讨论的是“70后”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我们选择了谢有顺、梁鸿、贺桂梅、张莉、李云雷、张定浩、张晓琴、李丹梦、

郭冰茹、饶翔、霍俊明、王士强等十二位批评家，尽管他们的个人风格和研究路向各不相同，但大体可以展示出“70后”一代批评家的风貌与特点，以及与其他代际批评家的差异性。

“70后”批评家，基本都有高学历，在学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文学批评训练，对中西方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都很熟悉。这是他们从事文学批评的起点，也是他们与前几代批评家的不同。这一背景使他们一起步就具有了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掌握了十分专业的批评方法。他们看上去似乎很少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并未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共同体”，但是，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却使他们较多地保有了个人的批评风格和个性，这是他们的幸运。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并不意味着是书斋里的事业，它确实需要批评家对社会历史有更广阔和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性认知。“50后”“60后”一代批评家，或许早年所受教育有欠缺，读书的年龄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上山下乡”，但他们因此也有了更多对社会历史和国情的切近认知。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文学时，能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展开批评活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除了那时的历史语境使然，与这代人如上所说的背景也不无关系。80年代的社会批判和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体现了这代人的价值观和关注问题的方式方法。相形之下，从书斋走出来的“70后”批评家，则不大可能是怀着这样的情结来进入批评工作的。

然而，作为代际，我们或许也真的无力来概括他们更多的共同性，如果说“70后”作家的创作还有着某些可探查的共性——比如经验的碎片化、历史记忆中公共性的消失、叙事美学上的琐屑化，等等，在“70后”批评家这里，则除了年代的相同，而并无太多的共同性。所以，与其勉为其难地去归纳，不如分别来谈谈他们的一些个性。事实上，“70后”批评家由于他们的出身背景和个人价值目标的不同，确乎表现出了

比较鲜明的个人特点。

就批评立场看，李云雷或许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例。他出身于农村，因此对乡村和底层生活的关注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底层写作”这一仍存争议的文学现象，在李云雷那里获得了不懈的支持和肯定。他说：“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①他在注重文学审美标准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学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支持先锋前卫探索的同时，更注重对传统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在密切关注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时候，也注意从其他艺术形式中看到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和同一性。因此，李云雷的文学批评不仅与当下文学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他的文化“左翼”的情感色彩，使他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介入意识，也使他成为维护这个时代底层写作最具活力的声音之一。他迅速地站在了文学批评的前沿，与他一直坚持的底层情怀大有关系。

在批评实绩方面建树比较突出，且与上个年代的批评家之间有更多

^① 李云雷博客：《略谈我的文学批评》，2013年3月6日。

传承的，应该是谢有顺。某种意义上，他可算是“70后”批评家的一个例外。他成名的时候，他们这一代大多数的批评家还在校学习。少年成名的他也有过乡村生活经历，因此，在谈到影响他的人与事时，他说：

“……更多的是一些渺小的人物，他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他们的内心却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比如我父亲的耿直和公正，我在福州时一些朋友的谦卑和纯粹，我在报社时一些同事的勇敢和敬业，等等。他们的存在，会构成一个不易觉察的精神气场，影响着你。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细微影响，有时比你的阅读和思考更加重要。”^①但是，谢有顺的出身背景似乎并没有与他的文学批评构成直接关系，他更关注的还是精英圈子，经典化程度高的一批作家，关注文学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但出身背景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面对当下的文坛，他曾引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他们不高兴。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这多少有些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不能说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无关。当然，有顺作为批评家留给人最多的印象，还是他活跃的身姿、过人的见识和才气，还有这代批评家文风中少见的诗意和老练。

如果要找一个“70后”学院派批评家的代表，或许还要数到贺桂梅。她在北京大学读书十年，留校任教后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批评家，但她的研究又一直与文学现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种身份，她可能更具历史纵深感，视野也更加宽阔。比如在谈到如何认识80年代的时候，她说：“90年代关于80年代的论辩，主要是在知识界内部展开的，而当前的80年代热，却是一个扩散到不同社会层面的话题。比如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现在对于80年代的想象和关注的热情，带有很强的‘怀旧’色彩。当80年代可以成为‘怀旧’对象时，就说明人

^① 姜广平：《“持志如心痛”——与谢有顺对话》，《西湖》2007年10期。

们意识到‘80年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可以站在一种新的关于现实的感知和对历史的重新确认的位置上‘回过头’来看80年代。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当然与当下中国经济‘崛起’，以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今天的‘80年代热’，是带有距离感的、对80年代的重新认知。如何认知80年代，也与如何判断、叙述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关。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崛起，有人认为这是‘告别革命’的结果，有人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80年代的改革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又比如，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阶层、阶级分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80年代的‘民主’诉求没有被实践，而有人则认为需要在批判80年代西方式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涵义等等。”^①这只是贺桂梅大量论述中的一个例子，但从中可以看出，她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是综合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一起提出来的。但是，它又没有离开当下中国的问题场，并且仍然是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70后”一代，有如此宽广的视野，实属不易。

另一个学院派出身，但却被称为“反教条主义”批评家的例子是张莉，清晰、准确和敏锐是她的特点。良好的学术训练并未使她变得迟钝，相反，她介入现场的反应却是更加机警和迅速。她自己说，在读研究生的七年时间里，“大都在图书馆里度过。从研一开始，我每天都去清华旧图书馆翻《新青年》《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在北师大也一样，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去翻看民国女校教材，各种民国教育杂志，从早晨到晚上。这些阅读是写论文的必备功课；但有些阅读，比如研一用半年时间做萧红研究，读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传记；还比如研二去北大图书馆翻

^① 贺桂梅：《重返80年代，打开中国视野——贺桂梅访谈录》，见《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代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创刊以来的《文艺报》等是兴趣使然。我很庆幸自己当年兴趣芜杂，这使我日后谈论很多问题时有了基础，对百年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①这样枯燥的学院训练，为日后一个批评家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莉的女性文学研究、孙犁研究、新锐作家的批评等，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如果谈到对80年代以来海派的“才子派批评”的传承，张定浩又是另一个例子。既写诗又研究孟子，确乎使他的文字有了更大的张力，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行使批评职能之时，他既没有诗人的缱绻犹豫，也不像从故纸堆里走出的老学究，而他的雄辩又确实没有辜负对孟子的研究。他的批评锋芒在当今批评家里罕有匹敌，他的直言不讳肯定会让一些作家心有顾忌。他在评论余华的《第七天》时指出：“闹剧式的叙述是余华的擅长，但在这样的闹剧中，能干是用‘有房有车有钱’来体现的，情绪是用哭闹和跳楼来表现的，夫妻和好是用下跪和打自己嘴巴来实现的，小说家得是看了多少狗血电视剧和网络小说，才能有勇气忍受这样老掉牙的架空设计？无论《第七天》的叙述者是生者还是死者，这都不再是小说，这是丧失了一切想象力和对生活细节的记忆能力之后的，属于活人的平庸。”不仅如此，张定浩还对《第七天》的某些评论也提出了批评：“因为《第七天》中描述了飘舞的雪花，有人就诗意地联想到乔伊斯的《死者》；因为《第七天》有对权力腐败的表达，有人就敏感地攀附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这些人应该好好再去读读乔伊斯和奥威尔，去看看对现实生活的爱和恨是如何在那些杰出小说家笔下诚实地纠缠在一起，去听听那些自由灵魂的生动对话，去感受那真正的悲悯，还有满怀敬畏的同情。”^②这样的评论，观点或许还可讨论，但足以见

① 周明全：《理想的批评环境应众声喧哗——访谈“70后”著名批评家张莉》，《西湖》2013年6期。

② 张定浩：《〈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见《批评的准备》，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出批评家的人与个性，不是那种中学老师批作文式的批评。它在切入文本内部的同时，通过更广阔的视角，与批评对象展开了真正的批评与对话关系。

此外，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的梁鸿对河南作家的研究，李丹梦对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张晓琴对生态文学和当下热点文学现象的研究，霍俊明、王士强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研究，郭冰茹对当代中国小说叙事的研究，饶翔对当下前沿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批评等，都展现了不同的视角、风格和才情，在当代批评的不同向度上各有建树。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从事文学批评的全部困难要远大于八九十年代。因为那个年代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是有可能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到处积满了问题，而且处理起来也相对简单些。到“70后”这代批评家，他们面对文学或文化的问题时几乎是进了无物之阵。不要说提出问题，即便是对一个事物的命名都显得格外困难。如果我们对“70后”一代批评家期待过高，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公平的。试想，“50后”“60后”批评家在这个时代又有怎样的作为呢？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困难……这些关乎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以及新闻和非虚构文体等对阅读和眼球的争夺，再加上学院学术制度、评价制度、项目制度等对学院批评家的制约困扰等，使文学批评更加步履维艰。因此，我们除了承认“70后”批评家尚未完成文学批评变革的现实外，还应该对这一代批评家怀有同情和敬意。

2016年9月，北京

目 录

新话语的诞生

——重读《班主任》 1

沈从文《看虹录》研读 7

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

——对 1998 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 15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 38

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

——《〈转折的时代——40—50 年代作家研究〉》笔谈
..... 53

挪用与重构

——80 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57

人文学者的想象力	79
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82
重讲“中国故事”	
——电影“大片”的文化分析	98
文学性与当代性	
——解读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	118
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	
——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	134
“今日批评家”笔谈·文学批评的“想象力”	
	155
重返80年代，打开中国视野	
——贺桂梅访谈录	161
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	
	181
1940—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分析	
	200
丁玲的逻辑	241

新话语的诞生

——重读《班主任》

1977年刊载于《人民文学》第11期的《班主任》在当时是一篇具有轰动效应的小说，它不仅成为刘心武的成名作，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第一个文学浪潮的滥觞之作。继《班主任》之后，《伤痕》等一大批揭露、控诉“四人帮”罪恶的小说纷纷出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悲愤而感伤的伤痕文学浪潮。开风气之先的《班主任》，其独特之处在于第一次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把矛头指向“四人帮”所谓“外伤”和“内伤”。现在我们重读这部从“文革文学”转向“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就会发现，隐于对“四人帮”控诉和指斥背后的是话语的转变。这篇小说的本质就是个人话语对畸形的集体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反动，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在否定和指斥失掉合法性的旧话语的同时，慢慢取得合法地位，并以优越者的姿态力图改造旧话语的一套策略。

“话语”（discourse）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福柯将“话语”界定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认为世界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控制整个意指的过程，“话语”和“权力”是构成社会文化的活的因素。某种程度上，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以集体为主体的意指活动可称为集体话语，与之相反的从人道主义出发以个

人为主体的则称为个人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一直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文革”时期这种二元对立的平衡状态被破坏，集体话语企图完全消除个人话语而成为唯一合法的权力执行者，而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及主体的回归亦即个人话语的运作，处于两者转换时期，必然存在着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的争夺。《班主任》就是个人话语如何一步步取得合法性而集体话语的合法性如何一步步丧失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本，它以明显的隐喻方式表明了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妥协让步，不断走向边缘化的过程。

福柯认为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通过话语而实现的权力才是切实而有效的。“老师”是文化的传播者亦即话语的传播者，本质上是权力的运作，因此这个职业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启蒙者的工作。正如小说所说：“人民教师，班主任，他所培养的……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小说以“班主任”命名，其寓意是深刻的。启蒙的本质是新话语占领旧话语的领域，并以优越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来瓦解、剥夺旧话语的合法性。为了取得班主任启蒙身份的合法性，小说文本做了以下策略性运作——对旧话语的定位与判决：“截至目前为止，在人类文明史上，能找出几个像‘四人帮’这样用最革命的逻辑与口号，掩盖最反动的愚民政策的例子呢”，而班主任则代表“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和美好的艺术的结晶”。由此班主任义无反顾地担当了启蒙的使命，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也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班主任成了当之无愧的启蒙者，他的合法身份与正确性毋庸置疑。

分析小说文本中的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可以发现这两者的合法性的前提是相同的，即爱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就在于爱国的程度，但是衡量的标准却在不知不觉中更换了，不再是集体主体的意识形态的肯定，

而变成“知识就是力量”——谁拥有更自由更明智的知识，谁就更有权力建设国家。集体话语中的集体主体，其合法性基础是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小说中这一点却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小流氓宋宝琦已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因此，谢惠敏所认为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已转换成为石红所坚持的“帮助犯了错误的人”，作为集体话语的代表谢惠敏其败势在她与个人话语较量之前就被划分好了。

《班主任》围绕是否收留小流氓宋宝琦来组建小说，其中中心情节似乎是如何处理失足青年，然而我们在阅读中发现，真正作为启蒙对象的，并不是小流氓宋宝琦，而是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宋宝琦的被改造地位是人所共知的，而谢惠敏却是个难题。她是“没有丝毫政治投机心理”“单纯而真诚”的班干部，她对于集体信念的维护较之班主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问题在于，她维护集体的方式是“错误”的，她是个染了“四人帮”毒素的孩子。小说文本先否决了“四人帮”的合法性：“四人帮”歪曲了领袖思想，“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而现在“是真格儿按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搞教育”，一场意识形态中的权力争夺变成了合法而自然的真与假、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由此，谢惠敏也失掉了其合法性，她的病症在于“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与盲从”，“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因此，她成了个“病孩子”，“甚至像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身上，都有着‘四人帮’用残酷的愚民政策所打下的黑色烙印”。谢惠敏是“文革”时期强烈而僵硬的集体话语的代表者，但随着“四人帮”倒台，她的话语丧失了尊严感和权威性，她所有的权力也随之丧失，亦即她在社会中活动的方式被视为不正常的病态行为，必须加以改造。这一点正是权力运作的残酷性。当她向班主任告状说有五个团员过组织生活时打瞌睡，当她惊叫要狠批《牛虻》这本“黄书”，当她理直气壮

地没收宣传委员石红的《青春之歌》……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已不再是权力话语的执行者，而成了新权力话语的改造对象，成为权力转换过程中的牺牲品。小说文本中的谢惠敏是唯一一个完全孤立、屡受打击的人物，她似乎正好代表了以个人话语重新书写“文化大革命”的文本中集体话语代表者的命运与处境。仔细阅读小说，会发现班主任对谢惠敏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心态：“四人帮”揪出之前，“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四人帮’揪出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清除”；而到小说最后，张老师开始反问自己：“就不能更直截了当地，更倾注全力地同谢惠敏谈心，引导她擦亮眼睛，认识真假吗？”——这三个阶段似乎正好可以说明个人话语在对集体话语转换过程中，由隐蔽地对抗，到模棱两可地共存，直至挺身而出地反击的三个隐喻性段落。

谢惠敏的弱势事实上是由于个人话语对集体话语的拒斥和反击：“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是黄书”……个人话语的代码一个一个出现，而且都是几乎毋庸置疑的代码。而与谢惠敏相对的个人话语的代表者则是小说文本中的另一个人物，班上的宣传委员石红，她是新话语认同并加以肯定的对象。“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双颊更为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这段对女孩子描写的文笔，完全凸现被描写者的个性以及描写者对这种个性特征的认同与喜爱，是对女性个人主体的溢美之词，比起对谢惠敏的描写来，差别之明显无须言说。而此刻坐在“春阳”里的石红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写“号角诗”，在呼吁“让我们的教室响彻抓纲治国的脚步声”。与此相反的是，谢惠敏却正在与班主任争论“黄书”问题，并且遭到否认。这个十分有

意味的情景告诉我们：石红已经成为新权力的真正代言人。整篇小说中石红与谢惠敏的每次争吵事实上都以石红取胜，并且得到了班主任的支持。原因就在于她拥有知识：“小书迷”的她“常常能够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去分析一些问题”，“往往比较正确，并体现在她积极的行动中”。文本中出现的个人话语：“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带褶子的短裙”《牛虻》《青春之歌》等都与石红有关，并得到班主任的体认。“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和“带褶子的短裙”是个人话语的重要代码，她表明了石红的性别色彩，其丰富而自觉的私生活空间正是个人话语认同的主导方面。正因为如此，班主任才指责谢惠敏为什么只穿长袖衬衫而不穿“短袖衬衫”和“裙子”。而《牛虻》和《青春之歌》作为个人话语的范本，也只有石红这种有“思考能力”的女孩子才如此热衷，而无论是失足青年宋宝琦还是变相失足的团支书谢惠敏，都受到“四人帮”执行的集体话语的毒害，一致认定这些书是“黄书”。班主任因为宋宝琦和谢惠敏拒绝阅读《牛虻》并且对它做出“不公正”的判断而感到对“四人帮”“愚民政策”有“火山喷烧般的愤怒”，这是个人话语被集体话语拒斥后紧张而焦虑的感情。但是如果班主任考虑一下，谢惠敏对于那些不听读报而打瞌睡的团员的态度，就会发现谢惠敏的愤怒也许并不亚于他此刻的情绪。

小说最后一个关于石红的场面是：“迎门的那间屋里，坐满了人。石红坐在屋中饭桌边，正朗读着一本书。另外有五个女孩子……她们都正听得入神”。通过这个场面，我们可以看出石红已完全取代了谢惠敏，坐到了发言者、引导人群的位置，成为新话语权力的合法执行者。路线的执行者，阶级斗争的成功的斗争者，这些优越身份都归到了石红身上。当谢惠敏念批宋江的报纸时五个团员打瞌睡，而当石红念个人话语时五个女孩子听得如此入神，两相交锋，优胜劣汰，结局已十分明显：只有个人话语才能真正吸引群众，引导群众；只有成为个人话语者才能真正